

鲜卑族是今黑龙江、嫩江流域的游牧民族，逐步西迁，386年在盛乐（今内蒙古呼和浩特）建国立朝，史称“北魏”。

### “王道衰而有能复兴”

北魏第三任皇帝拓跋焘，即著名的太武帝，立志“启国承家，修废官，举俊逸，黜除科繁，更定制科，务从轻约，除故革新，以正一统”，先后灭胡夏、北燕、北凉等，统一北方。然而，拓跋焘晚年脾气暴躁，诛戮过多，不仅给他本人带来灭顶之灾，也给北魏带来严重内乱。465年拓跋弘继位，即献文帝，时年9岁，由冯太后摄政。471年拓跋弘禅让太子拓跋宏，即孝文帝。拓跋宏时年才4岁，冯太后继续摄政。其两任间，实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，使北魏如王观国所谓“王道衰而有能复兴”，统称“孝文中兴”。

中兴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改革成功的典范。北魏刚从部落酋长联盟发展为国家，各方面较落后。到这时期官吏还没工资，得依赖贪污、掠夺和皇帝随意奖赏养家糊口。随着建政稳定，战事减少，掠夺的机会也少，问题越来越突出。于是仿汉制行俸禄，在原来户调之外每户增调3匹、谷29斛，内外百官以品级高低定俸禄等次。从此，再贪得一匹即处以死刑。立竿见影，官风民风大为好转。

东汉以后，户籍分为士族与庶族。庶民要向官府缴纳60%的租税，士族与荫户可以不缴。问题是还有人冒充荫户，租税流失严重。于是北魏颁“均田令”，不论官民，平摊赋税。此令限制了土地兼并，让自耕农比较稳定地占有土地。国学大师钱穆评论：“此乃魏孝文帝根据中国读书人而改革经济制度，故寓独特的历史文化精神，与西洋不同。”均田令历经北齐、北周到隋唐，实行约300年。

北魏建国后，利用宗主管理地方。宗主是一些大大小小的割据势力，显然不是长久之计。486年创建

# 有 中 兴 无 盛 世

## ——反思北魏“孝文中兴”

□ 冯敏飞

“三长制”，5家为邻，设一邻长；5邻为里，设一里长；5里为党，设一党长。三长制与均田制相辅而行。从此，中央政府的管理到达基层。后来，三长制成为北齐、隋、唐时期乡里组织。黄仁宇说，拓跋宏“在中国历史上最大的贡献为：重新创造一个均匀的农村组织，非如此则大帝国的基础无法立足”。

“改革开放”是一个现代词。其实，历史上的“汉化”与“胡化”，换言之就是改革开放。各民族都有所长有所短，少数民族向汉族学习，汉族也向少数民族学习。这在历史上是常见的事，不改革开放才不正常。

儒家热衷于“华夷之辨”，要放下面子虚心向少数民族学点东西十分不易。汉服峨冠博带坐轿子显得高贵，可是骑马就成问题了。汉服一上马就露膝盖，就要受冻，到北方根本吃不消。所以，战国时赵武灵王引进胡服，却遭强烈反对。赵武灵王耐心开导诸臣：“循法之功，不足以高世；法古之学，不足以制今。”坚定实行胡服骑射改革，提高军队战斗力，成功抵御北方威胁。可是直到南宋，朱熹还批评“今上领巾与靴皆胡服”，主张“要辨得华夷”。

汉文化曾经长期在东亚遥遥领先，这是显而易见的。但少数民族要学习，也是阻力重重。鲜卑拓跋部与曹操友好，送太子沙漠汗到洛阳为人

质。后来，晋武帝司马炎好心让沙漠汗回去，酋长们高高兴兴入塞迎接。没想到物是人非，沙漠汗不知不觉已汉化，引起酋长们的担心：“太子说话穿衣都不一样了，将来做大酋长，肯定要改变我们的传统，怎么办？”彼此一商量，把沙漠汗就地杀了，鲜卑族第一次汉化就这样夭折。拓跋焘统一北方后，重用汉族谋臣崔浩，明确宣布：“日后凡属军国大计，你们不能决定的，都应先征询崔浩的意见！”可是崔浩按汉族世家传统整理北魏民族，并按儒家“秉笔直书”原则续修北魏国史，鲜卑贵族就受不了了，纷纷指责他暴扬“国恶”，以致他本人被杀不算，同族远近都受连坐，汉化又一次失败。

孝文中兴取决于一个特殊因素：冯太后本身是汉族人，史称“事无巨细，一禀于太后。太后多智，猜忍，能行大事”。冯太后去世之后，拓跋宏仍然不遗余力地深化改革，扩大开放。开国之初将都城南迁到平城（今山西大同），已经很接近中原了，可他总觉得不够，亲政后第一件事就是再南迁到洛阳，与汉族“零距离”。光有“硬件”不够，还得有“软件”，紧接着，全面摒弃鲜卑旧俗，再全面采用汉族的生活方式和典章制度，如禁止鲜卑贵族、官员及家属着胡服，改穿汉服；禁止鲜卑贵族讲鲜卑语，改说汉语；将鲜卑族姓氏改为

汉族姓氏；采用汉族官制、律令；学习汉族的礼法，尊崇孔子，以孝治国等等。

### 双重优越性

李鸿章曾惊呼所处之世乃“三千年一大变局”，李鸿章所指的是中华文明遭遇史无前例的外来文明——西方文明的侵袭。就华夏民族来说，其实早就遭到过千古之变，即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。

早在公元前十余世纪，周人的祖先就常遭北方游牧民族的侵犯。商朝以来的中央政府，几乎没有不将它列为头等大事的，经常集中力量予以打击，有过多次重大胜利，但从没根绝其患。两汉之时，游牧民族入侵还只是劫掠，偷袭、抢劫一番就跑，跟内地神出鬼没的土匪一样。汉军反击，很难预料能在什么地方追上，常常在沙漠瀚海里辛辛苦苦追一两千里地，却连敌人影子都没追到。

其他游牧民族跟原来匈奴差不多。但这时期，一些游牧民族开始游牧了，并且突破部落联盟形式，开始创建自己的国家。所谓“五胡乱华”，游牧民族趁西晋“八王之乱”，不仅入塞而且占地建立他们自己的政权。这些割据政权大小不同，共同点是与汉人政权对峙，甚至要争“中

国”之正统。汉赵开国皇帝匈奴人刘渊就公然说：“夫帝王岂有常哉？大禹出自西戎，文王生于东夷，顾惟德所授耳。”他们居然也会引用“天命靡常”的儒家理论了，与他们的前辈判若两人。拓跋宏明确北魏继承的是晋政权，并问大臣：“你们希望朕追远商、周呢，还是想让朕连汉、晋都不如？”他们不认为自己只代表某一夷族，而直接以中华正统自居，比流亡的东晋更能代表中国。这是一种崭新的趋势，而且方兴未艾，千余年后至清朝而至高潮。

“五胡乱华”还有一个突出特点就是，往往得到部分汉人的认可及参与，甚至可以说是在汉人手把手指导下建政。事实上，北魏、契丹等与南方政权之争很难说仍是“华夷之辨”，而是中华正统之争。拓跋焘煮“佛狸”，事实上他真有几分离猫式的狡猾。向柔然进攻的时候，部下提醒他注意南方的汉人，他则哈哈大笑回答：“中国人都是步兵而我们是骑士，一队小马和初生的犊，如何能够抵御虎或者成群的狼呢？至于游牧的柔然人，他们夏令在北方游牧，事后向南方转移，至冬季则向我们的边境抢劫。只要在夏天去攻击他们的牧场，在这个时候，他们的马匹已经不中用了，传种的马要追寻雌马，雌马要照顾小马。只要在那时攻击他们，断绝他们的水草，几天之内，他们就要被

崇德立本的重德传统

□ 倪富静

在中华传统文化之中，崇德观念发端较早，可追溯至史前神话时期。不过，较为自觉的道德意识与思想则是在西周以后产生的。在《周书》《诗经》等相关典籍中，“德”字频频显现。探究分析可知，重德思想在周代的政治、伦理、宗教等各个领域中均有体现，成为统治阶层高度认可的政治管理理念。春秋战国以来，经过孔孟及其后学的进一步阐释与发扬，“德”之思想深入人心，成为有道君子的人格特质，“崇德立本”已然成为中华文化的典型特征。从两汉至近代，崇德、重德思想更是成为经济、人才、教育等诸多领域的重要价值理念。历史事实证明，中华传统文化中

的崇德智慧是经久不衰、熠熠生辉的。

### 修德立本 敬天法道

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历程之中，先哲对“德”观念的自觉探讨是在天道与人道的互动中展开的。古圣先贤对于“德”观念的认识与探讨经过了由“行”到“性”、由“外”至“内”的发展。在这样的发展过程中，人道、人德处于不断的升格过程中，与之相伴而来的，是人之主体性、能动性、实践理性的不断觉醒与发展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即使先哲认为人之“仁与义”之德足能与天道之“阴与阳”、地道之“柔与刚”并列而论，但人之所求在于仿照天之“健”而“自强不息”、效法地之“坤”而“厚德载物”，在于“与天地合其德”。在中国先贤看来，上天有好生之德。因此，人与天地“合德”的根本目的在于“赞天地之化育”“与天地参”，即通过尽己之性、成己之德而辅助天道之生生不息、大化流行，并不是无限扩张人欲而征服自然。

先哲之所以强调人要不断提高自我、发展自我，就是因为深信天、人之间是可以通过“德”来沟通的。这是孟子所讲的“诚者，天之道也；思诚者，人之道也”，也是张载所讲的“因明致诚，因诚致明，故天人合一”。其间虽有“敬德”“仁德”“诚德”“礼德”之侧重点的不同，但先哲修德正己、敬天法道的宗旨是从未改变的。这种高度弘扬人德而又始终对天德葆有敬畏之心的天人和谐思想，既是中华文化有别于西方文化的独有特质，更是中华文化历经变故却延续不衰的根源所在。

### 实德实修 与时偕行

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历程之中，先哲对“德”观念的自觉探讨源于对现实命运的关切与反思。徐复观先生说：“周之克殷，乃系一个有精神自觉的政治集团，克服了一个没有精神自觉或自觉不够的政治集团。”毋庸讳言，周人的精神自觉，正是体现在他们反思政权转移的历史现实并以“敬德”思想改造夏、商天命观的过程中。《周书·召诰》有言，回望历史，“有夏服天命”“有殷受天命”，但最终都逃不开“早坠厥命”的历史结局，

究其原因，都是因为他们“不敬德”之故。正是基于这样的历史反思，正是在对自我现实命运的关切之中，周人愈加意识到“敬德”之重要性。所以，他们才会在巩固政权的过程中不断强化“王敬作所，不可不敬德”“皇天无亲，惟德是辅；民心无常，惟惠之怀”的理性道德意识。

需要指出的是，周人所讲的“敬德”，并不是问神占卜等虚玄之事，而是“克明德慎罚，不敢侮鳏寡”“爱知小人之依，能保惠于庶民”“惟克厥宅心，乃克立兹常事司牧人，以克俊有德”等一系列保民惠民、裕民利民、明德慎罚、以德举贤的政治管理实践。这就是说，先哲所论之“德”，从一开始就是“实”德。这是一种从精神文化自觉基点处就奠定的崇实黜虚的重德传统，它对中华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。

春秋以降，礼崩乐坏。有感于社会变革时期的种种动乱与无序，孔子思而忧之，起而行之，自觉担负起文化传承与复兴的大任。鉴于历史与现实经验，孔子发现只讲外在的“德行”是不够的。只有将“德”之信念内化于人心与人性，它才能发挥更为有效的作用。所以，在“克己复礼”的文化实践中，孔子用“仁”德统摄了“恭、宽、信、敏、惠”等诸多道德条目，并将“仁”德视为人之为人的本质特征，赋予“德”以内在性、形上性与伦理性。

孔子讲：“人而不仁，如礼何？人而不仁，如乐何。”以“仁”德为复兴礼乐文化的内在支撑，从而构建了仁礼相协、内外相协的道德修养体系。更为重要的是，在孔子看来，德性修养是每一个人都应该做的事。能修德，即是君子；不能修德即是小人，即他所说的“君子怀德”。因此，当面对“知德者鲜矣”的社会现实时，孔子感叹道：“德之不修，学之不讲，闻义不能徙，不善不能改，是吾忧也。”

在与子张、樊迟等弟子论学的过程中，孔子也谈到过许多德性修养的方法。《论语》载：“子张问崇德、辨惑。子曰：‘主忠信，徙义，崇德也。’”“（樊迟）问崇德、修慝、辨惑……子曰：‘善哉问！先事后得，非崇德与？’”这就是说，崇德要从忠、信、义入手，即从自我内在的心性修养与提高做起。樊迟问及修德之方，孔子答之以“先事后得”，即踏踏实实去做。也就是说，在孔子这里，人作为



厚德载物

一种理性主体，其道德人格的修养显得尤为重要。而其中的修养方法并不是默坐冥想，而是“发愤忘食”“见贤思齐”“己所不欲勿施于人”等实践实修。

正是因为孔子重视实行，所以他并不因为强调内在的德性修养而忽视外在的德行施行。在政治维度上，孔子强调“为政以德”“道之以德”，依然重视具体的德治措施。《论语》记载，弟子们问及为政之方时，孔子回答都是各司其职、宽容待下、举贤任能、义以为上等非常具体的德政之方。是知，在孔子这里，“德”这个范畴已然具有了二重性。它既指道德主体的内在修养，也指道德主体的外在行为，其中内在地呈现出一种互动与关联，即由修养“德性”而实施“德行”。在《大学》之中，“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”的致思进路则较为明晰地展现了“德”之二重性所具有的内在互动过程。事实上，这种互动既是儒家所讲的“成己成物”，也是儒家所讲的“内圣外王”。修德是成己与内圣的起点，成物与外王则是修德之完成。

### 弘毅任重 平治天下

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历程之中，先哲探讨“德”观念的根本旨归在于治国安邦、平治天下。《尚书·尧典》中说，尧帝明察洞达、谦逊宽和、光辉明亮，能够发扬美好的德性，从而和睦九族、平章百姓、协和万邦。在这样一个施政序列中，在上位者的“克明俊德”是“亲九族”“平章百姓”的先决条件，其根本指向正

在于治理国家、协和万邦。

从某种意义上来讲，在上位者明德与否直接决定了国家的兴衰存亡。所以周之统治阶层才特别强调德行。到孔子这里，明德之主体有所扩大，既指有德之君王，也指有德之士。不过，从现实需要的迫切性来看，在上位者能够直接地发挥实际功用。所以，孔子强调“为政以德”，申明“其身正，不令而行；其身不正，虽令不从”。孔子一生颠沛流转、周游列国，就是希望能够唤起上层统治者的道德意识，让他们自任自觉，有效完成自己的政治使命与责任。

《论语》载：“子路问君子。子曰：‘修己以敬’，曰：‘如斯而已乎’？曰：‘修己以安人’，曰：‘如斯而已乎’？曰：‘修己以安百姓，尧舜其犹病诸！’”程子注解曰：“君子修己以安百姓，笃恭而天下平。惟上下一于恭敬，则天地自位，万物自育，气无不和，而四灵毕至矣。”可见，在孔子看来，君子修德的根本指向还是在于以德治天下。到了二程这里，君子修德的结果已然由为政以德扩展至天人合一。

事实上，在儒家德性理论的构建过程中，孟子是非常重要的环节。孟子主张以仁、义、礼、智为人生而具有的四种德性，主张性善论，进而从内向理路继承并发展了孔子的德性思想。照孟子的讲法，德性是人区别于动物的内在禀赋。因此，人之修德不能向外寻找，必须反求诸己。

当然，孟子同样懂得为政之德的重要意义，如他所言：“惟仁者宜在高位，不仁而在高位，是播其恶于众也。上无道揆也，下无法守也，朝不

俘或者被歼了。”

对此，法国历史学家雷纳·格鲁塞概括为“双重优越性”：以中国方法对付野蛮人和以野蛮方法对付中国人。

### 矫前秦之枉过正

民族建立的前秦是第一个统一北方的非汉政权。他们知道中原“民心思晋”，便努力汉化，要求官吏“学通一经，才成一艺”，恢复太学等等。不过，王仲荦在《魏晋南北朝史》指出，“前秦在多民族组成的国家其实没有作出融合的措施”，结果，淝水之战后，原先归附前秦的其他民族纷纷反叛，北方重陷分裂。

正是吸取前秦的经验教训，北魏全面汉化，力争与鲜卑民族一体化。然而，他连儒家的糟粕也一并收纳。拓跋宏将正在被历史抛弃的汉族士大夫门第制度强行搬到鲜卑社会，生硬地制造出新的门第：第一等膏粱门第，三世中出过3个“三公”……第六等丁姓门第，三世中出过侍郎。汉人到后来都弃之如履的东西，他也要捡去当宝贝。

499年拓跋宏驾崩，太子元恪继位，即宣武帝。元恪一上任就忙于扩建新都洛阳，再忙南伐，等他注意力从外部转向内部时，才发现民众强烈不满。北部六镇聚集了大批军功赫赫的人才，但由于用人只讲门第，他们升迁无望，又不适应汉族语言与习俗，纷纷反叛。奉命平叛的大将元颢是拓跋弘之孙、元宏之侄，根正苗红，他自己却叛逃，并在南梁支持下称帝，反戈一击，敲响北魏的丧钟。孝文中兴虽取得巨大成功，但由于无法平衡国内矛盾，无法再推动下去，中兴没有演变成盛世，王朝的命运也走到了尽头。



有所思

信道，工不信度，君子犯义，小人犯刑，国之所存者幸也。”所以，他的“性善论”还是落实到了君王的“仁政”之上。孟子讲，“先王有不忍人之心，斯有不忍人之政矣。以不忍人之心，行不忍人之政，治天下可运之掌上”，就是强调在上位者要充分扩展内在的仁义之性，进而“亲亲而仁民，仁民而爱物”。具体而言，孟子主张在上位者既要为民“制恒产”，亦要“教民以善”，切实做到“民贵君轻”。

总之，在中华先哲看来，在国家这个政治命运共同体之中，君王之言行均为天下法，这就是《礼记·经解》所讲的：“天子者，与天地参。故德配天地，兼利万物，与日月并明。”因此，“其在朝廷，则道仁圣礼义之序；燕处，则听雅、颂之音；行步，则有环佩之声；升车，则有鸾和之音”。惟有他们“居处有礼，进退有度”，才能实现“百官得其宜，万事得秩序”的安定局面。

当然，对于为政者而言，“修德”就意味着比一般人更高标准的克己、慎独与自律。因此，为政以德不仅需要现实反思的支撑，更需要勇于担当的内在信念的支持。曾子说，“士不可以不弘毅，任重而道远”，程子注解曰：“弘而不毅，则无规矩而难立；毅而不弘，则隘陋而无以居之。”诚然，对于每一位重任在肩、自觉理性的人而言，执德以弘、信道以笃、力行以久既是应然，亦是实然。